



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 The Logic  
Explaining Based on Historism-Economics

邓宏图/著

# 组织与制度：基于历史主义 经济学的逻辑解释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 The Logic  
Explaining Based on Historism-Economics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1AZD005）资助

本研究得到南开大学文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NKC1136）资助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6JA790056）资助

# 组织与制度：基于历史 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解释

Org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 The Logic  
Explanation Based on Historism-Economics

邓宏图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组织与制度：基于历史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解释/邓宏图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 - 7 - 5058 - 8815 - 9

I. ①组… II. ①邓… III. ①企业管理 - 组织管理  
学 - 研究 IV. ①F2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8592 号

**组织与制度：基于历史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解释**

邓宏图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21 印张 370000 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8815 - 9 定价：3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有几个问题必须说明：

这本书8年前就写成了，但8年中由于忙于别事，一直未作修改。8年中，我的同事雷鸣屡次和我讨论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问题，这使我不得不时时“回望”这本很不成熟的著作。也正由于和雷鸣的多次讨论，我便觉得要给这本书取一个稍显合适一些的名字，这名字就是《组织与制度：基于历史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解释》。

惜乎8年间我未就此类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因此，这本书今日出版，实在未能添补多少新的东西，这使我惭愧至极。

所谓历史主义经济学究竟是什么一种经济学呢？至少在我看来，它并不新鲜，它只不过在正统的经济学分析中加进了历史视角，也因此，它所研究的经济人，是“历史理性”的经济人。所谓历史理性，有这样一层含义：经济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习俗的”、“惯例的”和“制度的”，而习俗也好，惯例也好，制度也好，它们的形成都是“历史的”，是可以由此往上“追溯的”。重要的是，在我的分析框架里，这类习俗、惯例，抑或制度等诸多因素，全是“内生的”，而绝非或不仅仅是“外生给定”的。由于我在另一本书<sup>①</sup>中对此多有讨论，此处也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第三章、第四章是我和雷鸣共同完成的。第三章是雷鸣主笔，我加进了某些想法；第四章则由我主笔，雷鸣参加了若干次基于研究主题的讨论。感谢雷鸣允许我将他的有关比较经济制度和比较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纳入我的历史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本书第六章，我试图定义制度不确定性，也一直希望能在制度不确定性与这类不确定性对组织（或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之间找到一种可以合历史与逻辑于统一的“因果逻辑律”，但限于学养不足而未获进展。一个偶然的机，我读到 Bernard Salanie 写的一本书，觉得其中一个有关逆向选择的分

---

<sup>①</sup> 参阅邓宏图：《理性、偏好、意识形态与社会演化：转型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析很对我的“胃口”，于是就“拿过来”为我所用，发现能比较清楚地解释正式制度与被扭曲的制度之间的“缺口”，当然这种扭曲是人为的，即某些公权拥有者有意为之。重要的是，正是这些“缺口”，才导致“制度不确定性”的出现，也导致“权力租”的出现。

正如第七章的标题所表明的，该章似与本书主题不太一致。但这种不一致是表面的，甚至是一种“错觉”。第七章所要表达的，是伴随着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在急剧地变化，反过来，社会意识形态也会主动地引导组织演化和制度变迁，这意味着制度变迁很难说是一种单纯的自发秩序的（自由自在的）扩展，实在是诸多的主观、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本书附录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与第七章一样，这个案例仍然是要证明，信念或意识形态不仅会修正人们对未来事态的判断或看法，也会影响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或趋向）。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柳欣教授则为本书争取了一笔出版经费，亦深表谢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是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1AZD005）、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6JA790056）和南开大学文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NKC113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这些项目对我的相关研究所给予的切实帮助。

这本书要献给我的三个姐姐：邓丽君、邓美君和邓美玉，一直以来她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支持我的研究工作。

邓宏图于南开园  
2011年12月11日

# 目 录

<b>第一章 历史维度中的组织演进与效率原则：文化类型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要素的相关阐释</b> .....	1
一、总的说明：“历史理性”何以可能而且必要？ .....	1
二、诺思与格雷夫的研究路径：意识形态或心智模式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 .....	5
三、新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	7
四、可能的研究进路和逻辑结构 .....	11
（一）马克思理论范式：继承、补充与发展 .....	11
（二）组织演进理论分析史与“三个学派” .....	13
（三）组织演进的分析结构或逻辑：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 .....	14
五、经典案例的非经典“常谈”：意识形态与制度选择 .....	16
六、结语：理论及可能或可行的研究 .....	19
<b>第二章 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文献史与理论分析史</b>	
——古典、新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及比较 .....	23
一、总的说明：为什么是逻辑的“分析史”而非罗列（简单排列）的“思想史” .....	23
二、古典学派 .....	29
（一）斯密 .....	29
（二）康芒斯 .....	32
三、介于古典与新古典之间的马歇尔 .....	36
（一）作为进化论者的马歇尔 .....	36
（二）评论 .....	37

四、效率替代学派：企业性质与企业演进：奈特、科思等人的探索 .....	38
(一) 组织演进 = 效率替代? .....	38
(二) 评论 .....	43
五、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效率替代学派：布坎南与奥尔森 .....	44
(一) 布坎南和奥尔森的“演进”思想 .....	44
(二) 评论 .....	53
六、演进学派：马尔萨斯和凡勃伦 .....	55
(一) 马尔萨斯及其评论 .....	55
(二) 凡勃伦 .....	56
七、偏离新古典经济学之演化理论：演进学者阿尔奇安和赫西列夫 .....	58
(一) 阿尔奇安 .....	58
(二) 赫西列夫 (Jack Hirshleifer) .....	64
(三) 评论 .....	79
八、历史在演进中进行：诺思 .....	80
(一) 理论与史料的“经验实证” .....	80
(二) 评论 .....	87
九、进化博弈理论：青木昌彦的启示 .....	89
(一) 青木昌彦的“理论结构” .....	90
(二) 评论 .....	97
十、马克思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方式演进 .....	97
(一) 生产方式演进 .....	97
(二) 评论 .....	98
十一、结论 .....	98

### 第三章 理论和实证之间：传统社会下私人交易治理机制演进的比较经济史考察

——以格雷夫经济史理论评析为中心 .....	102
一、导言 .....	102
二、被文化信念、商人组织支撑的交易治理和市场拓展 .....	104
三、作为多边声誉机制的行会 .....	108
四、社群组织与非人格化交易的发展 .....	110
五、作为“私序”的国家 .....	112

六、传统社会中的日本和中国：文化信念、交易与社会经济组织	115
七、结论	122
<b>第四章 作为公共品的组织的性质</b>	<b>124</b>
一、导论	124
二、作为公共品的组织的性质：互惠、共容与交易	126
三、权利、权力与交易均衡	128
(一) 两人组（织）的讨论：权利、交易与均衡	129
(二) 权力与可置信威胁	131
(三) 三人乃至 n 人组合（织）的讨论：权利、权力与共容利益	132
四、选择性激励：惩罚与补偿	133
(一) 扭曲性激励：惩罚、补偿和中庸策略	133
(二) 组织惩罚：公共品博弈中的“一报还一报策略”	137
五、实例	141
(一) 家庭	141
(二) 封建行会	142
(三) 庄园制	142
(四) 汉萨同盟	143
(五) 马格里布商人联盟	144
(六) 人民公社	144
(七) 联产承包制	145
六、结论	145
<b>第五章 组织演进的逻辑：一个新的历史主义分析视角</b>	<b>147</b>
一、问题概要	147
二、组织、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的经济解释	150
(一) 组织（organization）	150
(二) 组织演进（organization evolution）	154
(三) 制度变迁（institution change）	155
(四) 历史主义的分析：对“古典化”的“杨小凯范式”的评论	161
三、组织演进的纯逻辑	164



(一) 正统博弈论中的“历史”与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 .....	164
(二) 合约选择、效率替代与组织演进“历史性质” .....	165
(三) 马克思定理及其政治经济学解释 .....	169
(四) 历史过程中的多阶段或多重博弈均衡 .....	171
(五) 组织演进的动因 .....	173
(六) 组织演进纯逻辑 .....	180
(七) 组织演进的“交易成本结构分析” .....	181
(八) 小结：历史理性假说下的“组织演进” .....	185
四、历史主义演进逻辑的博弈论解释 .....	187
(一) 道德与演进 .....	187
(二) 组织演进与多重均衡 .....	192
(三) 企业家类型、工人类型、权力博弈与组织结构：来自青木昌彦的案例 .....	195
(四) 有关企业家的简短讨论 .....	201
五、结论 .....	202
<b>第六章 制度不确定性与组织行为</b> .....	<b>204</b>
一、总的说明 .....	204
二、不确定性的简要说明 .....	206
(一) “不确定性”的一般理论说明 .....	206
(二) 有关“不确定性”的经典理论 .....	207
(三) 几点评析 .....	214
三、组织行为：不确定性、风险与选择 .....	216
(一) 不确定性、历史理性与历史主义的分析 .....	216
(二) 不确定性与组织行为调整的基本逻辑 .....	218
四、转轨问题：制度不确定性对企业家和组织行为的影响 .....	222
(一) 状态依存的制度 .....	223
(二) 潜规则与制度不确定性 .....	225
(三) 制度不确定性、潜规则、交易成本与产出率 .....	226
(四) 制度不确定性：图形的进一步解释 .....	229
五、不确定性与组织选择 .....	230
六、不确定性：历史与现实 .....	236
(一) 融资问题 .....	237

(二) 租赁和劳动市场中的“承诺问题” .....	238
(三) 进入与退出问题 .....	238
(四) 企业内部问题 .....	239
(五) 一个案例的简要讨论：制度企业家迈高文 .....	240
七、结论：不确定性与历史主义分析 .....	240

## 第七章 似乎与本书主题相偏离的话题：思潮与组织演进编年史

——1949年以来的政治与经济政策的路线 .....	242
----------------------------	-----

一、导论：政策源流考 .....	242
------------------	-----

二、毛泽东式的政治经济学 .....	243
--------------------	-----

(一) 土地问题 .....	243
----------------	-----

(二) 政治制度与国家战略 .....	244
---------------------	-----

(三) 所有制 .....	246
---------------	-----

(四)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 .....	248
--------------------------	-----

(五) 价值和价值法则（规律） .....	249
-----------------------	-----

三、论十大关系：社会主义的探索 .....	253
-----------------------	-----

四、“毛泽东式工业革命”的后果 .....	258
-----------------------	-----

五、计划与市场：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	263
------------------------	-----

(一)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1956~1979年 .....	264
-------------------------------	-----

(二)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逻辑：1979~1992年 .....	271
------------------------------------	-----

六、转型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至今 .....	275
--------------------------	-----

七、结语：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 .....	279
----------------------------	-----

## 附录：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

一、有关官商问题的综述 .....	281
-------------------	-----

### 二、西汉简史与“官商”的缘起：财政波动与帝国

财政选择 .....	283
------------	-----

(一) 基本理论框架 .....	283
------------------	-----

(二) 西汉的财政 .....	287
-----------------	-----

(三) 汉武帝时期的灾荒与战争 .....	290
-----------------------	-----

(四) “官商合一”制度安排的后果 .....	294
-------------------------	-----

(五) 基本结论 .....	295
----------------	-----

三、“官商合一”的政治经济学 .....	295
----------------------	-----

(一) 解析“行政效率” .....	295
--------------------	-----

6 .....	▶ 组织与制度：基于历史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解释	
	(二) “官商合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297
	(三) 史料说明 .....	304
	四、结论 .....	307
主要参考文献 .....		310

# 第一章

## 历史维度中的组织演进与效率原则： 文化类型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 要素的相关阐释

---

### 一、总的说明：“历史理性” 何以可能而且必要？

本章要对组织演进的逻辑提供一个概要性的、综述性的分析。我们希望首先在概念上能澄清一些问题，例如，一个组织，无论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它的基本的演进方式或形态是什么？究竟什么因素决定了组织的结构及其演进方式？对于组织，在经济学上我们可以简单把它定义为“一整套的合约关系（或结构）”。组织的存在肯定和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甚至和一国一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

在研究组织及其相关问题时，我们尝试使用一种新的分析方法，直白地说，这种方法就是新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借助历史理性的“理论假说”，我们实现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然而，在这些理论“综合”中，马克思的“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是决定性的。

人们会问，这三种体系（实质上是两种体系，因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已经纳入新古典经济学里头去了）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如何能够兼容起来呢？需要谨记于心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即理性人假设，它表明经济

人是在追求利益的动机（或算计）的驱使下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sup>①</sup>。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赖以分析的前提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样的，但是，它在如下两方面作了扩展：

一是信息不完备、知识不全面，因此，人是有限理性的。西蒙对有限理性的论述、分析做出了巨大贡献（1997，中文版；2002，中文版）。从人的有限理性，可以推出市场的缺陷，也可以推出政府的缺陷，使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组织（治理）、第三方监督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上，以此重新诠释人类的行为及其经济后果。要有效地论证组织的经济功能和组织演进的动力结构，单靠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并以此作为分析前提）达不到研究目的。因此，说有限理性的假说改变了经济学的分析面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二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假定人有机会主义动机（威廉姆森，中文版，2001，46~54）。这个假定在分析组织演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它说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激励机制设计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必须让人说真话”，即尽可能消除不对称信息造成的机会主义，从而使委托代理成本减至最低。

马克思经济学的有关人的假定则完全不同。一般而言，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或理论范式里，有关人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比如，在分析资本家的动机时，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身，总是尽可能多地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里得到更多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以此观之，马克思

---

<sup>①</sup> 许成钢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有五个最基本的“不相关定理”，亦即经济学理论的“五个基准”。第一个基准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这个理论意味着经济体制和经济利益不相关。这是一个在假定市场完备，不存在不对称信息时的经济理论。在阿罗-德布鲁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体制“等价”。第二个基准是莫迪里安尼-米勒（MM）定理。金融工具和效益不相关。公司无论用发债还是发股票的方式融资，从利润角度看结果是一样的。MM定理所假定的分析前提同样是不存在非对称信息，即厂商和投资者间没有不对称信息，股息和资本所得均不征税，买卖证券无成本。当金融工具和效益不相关时，金融体制和效益也就不相关了。第三个理论基准是科思定理，其基本结论是，当交易费用等于零，法定产权的初始配置同效率无关。第四个理论基准是卢卡斯的货币中性定理。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之一。货币中性从狭义角度看，意味着从长远看货币政策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无关。从广义看，它意味着金融工具、金融体制同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不相关。第五个理论基准是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这个理论的基本推断是，除法庭以外的执法体制同效率不相关。该理论隐含的结论是，给定法律完备、司法公正的条件，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只要有法庭执法就足够了。这个条件还可进一步解释为，所有的参与人都是理性的，都懂得最优法律的惩罚，都会推理，所有的人在犯法前都能精确计算，从而决定是否采取违法行动。这个理论意义在于，只要给定这些条件，执法体制同执法效率不相关。参阅许成钢：《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载于《比较》，2002年第1期。实际上，这些理论都是资源最优配置的“效率观”的一系列变种，还是形式逻辑的推导结论。有必要强调，要理解组织演进，更应关注历史逻辑，从演进角度看待一切经济现象的变化。理论基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要理解现实问题为何总偏离这些基准。这就要从历史演进中寻找答案。有必要提及余斌的论点，他认为，即使认同MM理论的假设前提，它的结论仍然不能成立。基本的逻辑理路在于，只要承认股权和债权有不同的经济含义，资本结构，即股权和债权结构，就不可能和企业价值无关。我认为，余斌这里所隐含的正是我们极力提倡的“历史逻辑”。参阅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

秉承的是理性人假定，和新古典经济学毫无二致（Carling, 1986）。但是，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也特别论证过，“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这说明，单纯地用经济人假定来概括马克思有关人的行为动机肯定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化动物，人具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本质性的东西，但是，人生而自由，但无不处在一种不能自己（完全）把握的社会经济环境里，生活在一种被“物化”的环境里，把人性、道德伦理、手段都“目标”或“目的”化了，即人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被资本、利润、收益和政治权力“异化”了，因此，人的动机就很难用“个人理性”简单地定义。通俗一点说，在马克思看来，人有寻利的动机，也有社会偏好，还有一种作为个人确能感觉、但难以摆脱的“东西”（如习俗、意识形态或两者的混合物）在决定着人的行动（或行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他承认人的理性动机，但与此同时，还有文化、习俗、社会制度或者说权力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影响（中文版，1985）。

有必要指出，人的动机要比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倡的“经济人理性”复杂得多。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前者对作为“类”的人的社会性的阐述以及对异化的分析，使人们意识到决定人的行为动机不仅有寻利的心理的逻辑结构，还有作为习俗、道德伦理和“异化”的“社会性偏好”，这些偏好不能单纯地被认为仅仅是“外在约束”，而是内化在个人的心理上的“内在约束”（马克思，中文版，第1卷，1975；1985），它们与理性的寻利的逻辑结构一起，构成了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的“内在机制”。因为，假如把“社会约束”纯粹看做是一种“外在约束”的话，那么，我们并不能据此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与马克思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有什么根本性区别，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可以把所有这些约束“外生化”和“模型化”而写入到目标函数中。如果是这样的话，考虑习惯、习俗、社会制度、道德伦理体系，以及马克思反复说明的社会生产关系并把这些要素引入到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的“内在机制”中去，就构不成任何理论上的创新，因为它们同样可以被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所同化或消融。作为“类”存在的人的“社会性”，由于习惯和习俗的“力量”，由于道德伦理的“力量”必然要“内化”为一种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的“内在约束”，而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所惯常而且易于处理的“外在约束（条件）”（邓宏图，2002；2003<sup>①</sup>）。卢卡奇所讨论的“物化”和“阶级意识”不是人的一种主动的“选择”后的产物，而是基于社会意识与人的物欲的混合物，这至少证明习俗、习惯或社会意识形态对人而言不仅仅是外生约束，而更是人的行为动机中的“重要因素”（中文版，1996）。

阿玛蒂亚·森曾经谈到过两个关键词，即承诺和同情，前者涉及一种权利、责任和义务对于当事人的关系，后者则是人的内心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中文版，2002，267~271）。森进一步指出，由同情、道德伦理和社会习惯等要素构成的这种由社会性所“引致”的人的“内在约束”决定了人的行为动机和他们的选择性行为。很显然，这里的“同情”绝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逻辑结构内的“原汁原味”的构成要素，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来说，它是异质的“东西”。恰恰在这里，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解释（邓宏图，2008）。

学者们反复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的体系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是不能兼容的，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其基本的理由就是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假定前提完全不同，是异质的，因此，在理论上，人们很难实现两者的“综合”。但是，假如把“类”、“异化”、“同情”或“习俗”等这些社会性“要质”引入经济人的“理性假定”，则所有这些理论上的“不可能性”就变得“烟消云散”了。基于此，我们构建了“历史理性假说”的分析框架，它既兼容马克思的理论前提，即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也能兼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即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的是“由寻利的心理动机所决定的逻辑结构”。当考虑这两方面的影响，或者，通俗地看，当既考虑人的利益取向，又考虑人的社会价值取向，则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的诸因素就可以“复合”而成决定人的行为的新的动机，笔者称此种动机为“历史理性”（邓宏图，2008）。

实际上，在进行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也的确在客观上存在着把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综合的技术需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为研究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极好的分析路径，但这种理论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它给了我们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却忽略了具体的细节，即在生产方式的既定结构中，人是如何选择的，这种选择所导致的制度后果与经济绩效究竟如何，进一步地，制度后果所隐含的社会分配结构处在什么状态，这种状态对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布、政治与经济地位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外，马克思生产方式演进理论也没有考虑成本问题。一个基本的质疑是，生产方式演进不可能是毫无成本的演进。给定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现状这一条件，那么，假如不考虑成本的话，生产关系就可能迅速调整以尽可能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马克思的处理方法是，假设生产关系是一个容器，生产力是一个在容器中活动的“物质”，然后生产力慢慢长大，直至长大到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的地步，此时，作为容器的生产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因为壮大的生产力有足够大的力量击毁这个容器。在这个分析逻辑

里，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未发现任何有关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的成长而调整所导致的任何成本问题。问题在于，生产关系不仅仅是容器，它有着相当复杂的内容，它包括社会制度、繁杂的组织形态、所有制关系、产权的分布状况，等等，而生产力也不是一种在容器里生活的“鱼”或别的什么东西，因此，引进成本因素就显得极有必要。在我们看来，把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结合起来，是分析制度变迁与组织演化的可行的研究路径。下面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诺思与格雷夫的组织演化和制度变迁理论。

## 二、诺思与格雷夫的研究路径：意识形态或心智模式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sup>①</sup>

诺思和格雷夫都特别强调信念、偏好、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虽然分析方法和视角稍有不同，但其基本观点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认为，人既有个人偏好也有社会偏好，即人们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还会关注他人的行为并关注过程如何产生。在应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时，自利和利他的双重偏好形成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和意识，特定的对环境的反应机制就形成一种特定的心智模式。心智模式和制度都是人们用来构建环境的重要方式，所不同的是，心智模式是由个体的认知体系创建的用来解释环境的内在因素，而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用来构造并规制环境的外在因素。它们可以被看做是认知的不同等级，相同或相似的环境更易于形成相同的心智模式，一组共享的心智模式框架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信念，它形成人们对背景的概念和认识。

那么，特定的心智模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如何影响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方向的？诺思（中文版，2008）和格雷夫（中文版，2008）一致指出，人们是通过学习过程形成特定的心智模式并通过信息的交流生成共有的意识形态。学习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于背景和环境的初始印象对事件空间进行分类，由此形成解释环境的心智模式。类和心智模式又

<sup>①</sup> 有关论述参阅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淮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又参阅 Avner Greif (1993),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The Maghribi Traders' Coalitio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3, pp. 525 - 548. 1993. Avner Greif (1994), "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 5, pp. 912 - 950.



会对新的事件空间产生反应，从而进一步加强、确认或修正最初的分类和心智模式，这就是学习过程的第二层次。正是通过不断地自我学习和相互交流过程，人们形成社会性和规范性的内化信念，这些信念会引导人们的行为，可观察到的行为又会进一步确认这些信念的重要性，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使自我实施的规则和制度处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形成一个自我实施的行为信念集。在这个信念集合中，每一个人都相信别人会以制度规定的特定方式行事，在这些信念情况下，每个人按这样的方式行动就是最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一项好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自我实施并持续存在，就是依赖于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和意识形态，人类的意向性选择行为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同时，诺思（中文版，2008）和格雷夫（中文版，2008）也认识到，由于人类的学习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当外生参数等背景发生变化时，人们过去内化的认知和信念往往与新的事件空间产生冲突，要形成一套新的内化信念集既耗时耗力又需要很高的交易成本，这种认知的相对滞后与行为性信念的根本不对称使得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缓慢的、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因此制度变迁并不会频繁地发生。而一旦发生，在规则层面，组织形态层面，信念、偏好与意识形态层面将是全面地、相互补充地进行的。

诺思讲述了中世纪西方世界兴衰的历史故事。中世纪初期基本的制度是封建采邑制度，当时技术原始而落后，土地和其他资源相对充足，持续不已的人口增长是促成中世纪高段增长和发展的内在要素，由于劳动对土地的相对富余，劳动生产力大大削弱，农业部门生产能力进一步下降，这就迫使贸易和商业部门的范围快速拓展。然而，一个地区要想获得扩大市场所带来的好处，它就必须认识到，商业的存在是以稳定的保护财产的基本法律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使现实的政权迅速地确认并推行这些法律原则。14、15世纪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采邑经济的溃亡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两个世纪虽然充满着饥荒、瘟疫和连年的战争，但是一种新的秩序总算诞生了，社会组织传统形式解体了。西欧经济实现了稳定的增长路径。至于近代西欧各国经济的不同表现，则可以追踪到不同的所有权体系的产生，这些不同的征税体制和财产所有权体系一方面在英国和荷兰促成了显著的增长，另一方面却阻碍了法国的发展，甚至导致了西班牙的萧条和衰败（中文版，2008）。

格雷夫讲述了中世纪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人的贸易扩张的故事，通过对历史的再现与考察回答了为什么15世纪的欧洲和穆斯林世界走向了不同的贸易道路，并解释了其背后隐含的制度基础与政治和社会结构。11世纪